

书场内外：新见《申报》所载 扬州评话相关史料考释

王丹 许建中¹

【摘要】新发现《申报》所载扬州评话相关史料十六则，均不见于相关研究论著。胡延龄《扬州评话小史》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关于扬州评话发展史的学术文章；老舒《记扬州评话家康、王》一文记载了康又华、王少堂等名家在沪上书场的说书时况，并进一步提出了扬州评话“追古励今、雅俗共赏”的重要艺术准则。同时，《申报》中有十四则关于扬州评话在上海各电台和书场的演播说书史料，关涉到张少夫、郎照明、王少堂等艺术家的相关曲目，这标志着百余年来扬州评话作为一门以书场为中心的讲演艺术，首次迈出书场之外，以“无线传输”的时兴方式进行演播，极大地拓展了其传播和普及程度。通过这些史料考梳，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扬州评话历史起源与发展的认识与研究。

【关键词】扬州评话 书场 无线传输

《申报》作为晚清民国时期海内第一大报，虽立足上海，影响力却辐射全国，登载信息也无所不涉，品类繁多，至今仍具有新闻史、社会史、艺术史等多重价值。以扬州评话为中心考察发现，《申报》登载了相关史料十六则，分别关涉到扬州评话艺术小史、扬州评话在沪上书场演出告白、扬州评话艺术家传记、扬州评话在“上海无线电台”录播剧目等诸方面，也涉及晚清民国时业已成名的张少夫、郎照明、王少堂等扬州评话艺术名家在沪上的演播情况。从时间上看，《申报》所载扬州评话史料起于民国十四年(1925)，结束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跨度二十三年。这些史料记录反映了扬州评话在上海书场内外的演播发展实况，是研究扬州评话在民国时期发展演进的重要史料，具有重要的价值。目前，这些材料尚未被相关研究者注意，亦未曾有论著提及。因之，本文将《申报》所载十六则史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整理汇录，并结合扬州评话发展情况，将其列类考释介绍，与诸家探讨。

一、艺术源流：新发现的扬州评话艺术小史

《申报》登载最早的一则关于扬州评话的材料是胡延龄的《扬州评话小史》，载于《申报》1925年5月17日第7版。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最全、最详细的关于扬州评话艺术发展简况的学术札记，具有极高学术价值。本文不避烦琐，将这则新近发现的材料择要誉录如下：

江苏评话，夙分两派：一为苏派，一为扬派。苏派事迹，时见于杂志报章，兹将扬派之源流变迁，及其盛衰得失之迹略叙于左。

扬派评话远祖，实数汪中。中字容甫，清高宗时人也，善文章，及弱冠，声誉即满大江南北，与阮元、焦里堂称“广陵三才子”，后阮以翰苑起家，位列卿贰，焦以经学噪京华，而中则屡困场屋，落拓不堪。每当春秋佳日，辄在茶坊酒肆演讲古今轶闻以自遣。辞令绝妙，谈笑风生，四座倾倒，人多目为柳敬亭再生焉。其弟子悍敬、马暄，能传其衣钵。敬讲《别姬》《乌江》二节，声调苍凉，闻者泪下；而《逼宫》《献地图》《哭祖庙》，其口吻身段，亦皆自成家数。样、马在当时实足与汪中鼎足而三

¹作者简介：王丹，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许建中，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也。中逝世后，敬、暄亦俱老。敬弟子彭尤，初讲《赵氏孤儿》《望夷宫》《杀吕伯奢》等，名不甚著，后乃自排脚本说《红楼梦》，在扬州校场安乐茶馆，复说《刘老老（姥）入大观园》等，座客达千人，多士绅显宦，无不为之捧腹，得赠金甚镇。此为扬派卖艺之始。初汪中、悍敬、马暄等说书，皆不受人钱，且所说概系历史故事，意在借酒消愁，讽刺公卿大夫，在评话界中可称名士派。及彭尤而拜金之风大盛，传徒非费金不纳，献技非代价不往，评话遂成为一种职业，与江湖卖艺者流，同列一科。而所演脚本，亦愈趋愈下，座客亦杂娼优、厮养与皂隶于一堂矣。

彭尤传弟子极多，在脚本上共分五派：一为历史小说派，所说为《列国》《三国》《西汉》《岳传》等；一为家庭小说派，所说为《红楼》《天雨花》《再生缘》等；一为侦探小说派，所说为《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一为侠义小说派，所说为《水浒》《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等；一为神怪小说派，所说为《西游》《封神》《白蛇传》等。尤弟子各擅一派，已属难能，而尤则无一不精，其天才在评话界中可称国士无双。扬人至今犹尊之为说书大王焉。

先是汪中及其弟子悛、马，均以演讲脚本中最热闹或最能感人之一节为能事，彭尤则长篇演讲，如《三国演义》必自《曹操献刀》说起，至《哭祖庙》止；《红楼梦》必自《黛玉探亲》说起，至《宝玉哭灵》止；《彭公案》必自《三盗九龙杯》说起，至《捉到九花娘》止；《水浒》必自《拳打郑屠》起，至《收玉麒麟卢俊义》止。……

洪杨乱后，尤弟子多物故，扬派评话稍衰。同治年间，金国灿崛起，说跳打《水浒》，技术惊人，状武松当年之玉环步、鸳鸯脚，惟妙惟肖。李国恢与金同学讲《水浒》于石安国，后见己艺不能出金上，乃改攻《三国》，博览群书，侧重考据，士林中人多趋之，与国恢名俱大噪。又有龚云甫者，善说《清风闸》，状皮凤山之为人，诙谐百出，座客入场，自始至终，笑声不绝。之三人者，为扬派评话中兴之健将。所可惜者，金之《水浒》、龚之《清风闸》竟与彭尤之《红楼梦》同悼失传，而李之《三国》遂独步于评话界。然李所传弟子虽多，而著名者，祇大弟子康国华。康于数年前已归道山，李派说三国者，近祇吴国良一人，如硕果仅存国良。而外又有姚国庠、薛宝珍，但此道中人多皆姚薛为野狐禅，不足道也。

跳打《水浒》已作广陵散，曹玉凤遂重排脚本，注重插科打诨，颇能使座客哄堂。再传至王玉堂，技平庸，仅能假借曹氏声誉糊口四方。玉堂传子少堂，居然青出于蓝，尤以武松十回，能追踪玉凤，犹存曹氏当年遗风。与少堂齐名者，又有马汉章，其余便不足观矣。

《清风闸》自龚死后，奋起者为张捷三，并无师传而能得龙之神髓，且善说笑话，未讲正书前，例讲笑话三则，措辞敏妙，使人绝倒。张后无继起者，厥后之诸子芳、子芝兄弟，方之前辈，相去远矣。

此洪杨乱后之三大派。此外复有两派：一为西汉派，一为大清传派。西汉派创自刘椿山。椿山本世家子，年十六入泮，十八下南闾，遂领乡荐，翌年公车北上会试，南宫落第而归，羞愤不已，因得疯癲症，晚年忽愈，家人恐其外出肇祸，仍禁之斗室中。椿山因生平酷喜读史，肇《汉书》，遂排《西汉演义》脚本，教其子春霖，朝夕演讲以自遣。未几椿山病故，家中落，春霖遂卖艺糊口，其名大震。传徒方公望、胡芳云，若现在犹存之。刘松山、戴善章，其传三传之弟子也。大清传派包括《彭公案》《施公案》《万年青》三书，蔡宗樊独得此中神秘。蔡死，其徒仅各能说一部，如现说《彭公案》之李国贤，说《施公案》之王建章，说《万年青》之殷萍卿，皆其数传后弟子也。

西汉、大清传两派而外，又有说《绿牡丹》之郎照明，说《八窍珠》之朱德春，亦负时誉。……光复后，扬派新添脚本甚多。如《西厢记》《荡寇志》《儒林外史》《镜花缘》《绿野仙踪》《济公活佛》等，均会蜚声一时，然不久便无人过问。最近，邢江人士倾倒已故名小说家李涵秋不已，评话界因将《广陵潮》《战地莺花录》《好青年》《魅镜》《活现形》《镜中人影》等，排成脚本，登场演讲，于是人山人海，又趋之如鹜矣。扬派评话遂又有新派旧派之分，现方竞争不已也。

新派中之负盛名者，为薛之铸。薛本书生，曾受师范教育，李氏说部之脚本，多出其手，颇有新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处处痛下针砭，因此青年学子，多喜就之，又善诙谐，一登演台，清辩滔滔，层出不竭，使人忘倦。薛弟子孙少兰，则以善骂著

名，其优点在能将现代社会罪恶，曲曲描摹而出，亦不可多得之人才也。近日薛、孙二人，拟设评话学校，灌输其业弟子，以常识以提高评话业在社会上之位置。此种办法果见实行，则扬派当有相当之进步矣。

旧派中，人知株守成规之无益，亦思努力改良，现已于未讲正书前，先演国耻小史一节。马赤忱最著名，余尝听其说鸦片之战至沉痛处，马固声调悲凉，而座客亦簌簌泪下。尤可贵者，马又能将国耻事实，编成小曲使座客相和而歌，感人尤深，诚杰出之人才也。^[1]

扬州评话作为平民口述文学样式，“口耳相传”“述而不作”乃其特点，自古无文字史。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政府和学人的推动下，开始编纂《扬州曲艺志》（1993）《中国曲艺志·江苏卷》（1996）等曲艺书目，扬州评话才有了较为详尽的文字史。胡延龄这则《扬州评话小史》不仅是最早、最详细的扬州评话文字史而且对扬州评话的整理研究亦有导夫先路的意义。目前学界认识和评述此一阶段扬州评话发展时，大都依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董伟业《扬州竹枝词》、林苏门刊刻《邢江三百吟》等地方志书、唱词俗录中的相关记载，吉光片羽，远不及胡延龄这则史料详尽清晰。

此则材料记录了扬州评话自清高宗乾隆至民国初年百余年的发展史况，源流分明、脉络清晰、记录详细。概括言之，胡氏这则材料将扬州评话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各具特点：

一、清乾嘉时期，扬州评话即非常注重脚本的创作和演绎，尤其是自彭尤始，其脚本逐渐增多，概可分为五派：历史小说派、家庭小说派、侦探小说派、侠义小说派、神怪小说派。这种划分，比目前将清中叶以来扬州评话笼统分为“市井小说”“武侠小说”“名著新编”^[2]的三分法，更为细致、合理。尤应注意的是，鼎盛时期的扬州评话，其演绎场所“东至通州、南至镇江、西至南京、北至清江，与苏派评话分庭抗礼”^[3]，其演绎地域沿运河两岸散开，漫延于江苏中、北部诸地，其广泛程度远非扬州地方性评话艺术所能拘囿，可算是清中叶影响较大的地方性评话之一。

二、扬州评话受“洪杨之乱”（即“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影响颇深，曾人才凋零、一蹶不振。同治年间，在“西汉派”刘椿山、“大清传派”蔡宗燮等艺术家的引领下才逐渐兴盛。两派各擅胜场，“西汉派”以《西汉演义》等讲史演义类脚本为主，“大清传派”以《彭公案》《施公案》《万年青》等清代小说类脚本为主，均风闻一时。此一时期可算作扬州评话的中兴阶段。

三、民国初期，扬州评话分作新旧两派。尤其是新派书家，结合时局和大众需求，以扬州作家李涵秋的小说为底本，新排了《广陵潮》《战地莺花录》《好青年》《魅镜》《活现形》《镜中人影》等，观者“人山人海，又趋之如鹜”，重现昔日光彩。这些结合时政编排的扬州评话脚本，一如胡延龄所说，“能将现代社会罪恶，曲曲描摹而出”，具有强烈的讽喻现实意味。同时，民国初年，“薛、孙二人，拟设评话学校，灌输其业弟子，以常识以提高评话业在社会上之位置”，也反映了扬州评话艺术家们创办评话学校、提高评话业界地位等带有锐意改良性质的积极举动。

与众家叙述中扬州评话源于柳敬亭不同，胡延龄认为扬州评话远祖实乃清中叶著名的文史学家、“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汪中（字容甫，1744-1794）。汪中性情放达，揆览经史，其人才情天纵，时人有“无书不读是汪中”之说。汪中才情虽高，但仕途却颇多坎坷，及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乡试落第，遂不复应试，专心治学。由于早期扬州评话“口耳相传”，相关文字材料极度缺乏，汪中说书一事，现无文字材料可证，但这则材料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值得进一步研究。事实上，汪中弃科举后举业经史，闲暇之余，“每当春秋佳日，辄在茶坊酒肆演讲古今轶闻以自遣”，也完全符合情理。其弟子炸敬（字子居，1757-1817）乃“阳湖文派”创始人之一，胡延龄所云“敬讲《别姬》《乌江》二节，声调苍凉，闻者泪下”，查其所著《西楚都彭城论》《三代因革论》等文，均有相当篇幅关涉到西楚霸王项羽事迹，其文旨也表露出对项羽这一英雄人物的仰慕与悲悯。由他亲自讲述《别姬》《乌江》二节，也似合乎情理。故胡延龄所著此文，属文人撰写的扬州评话史，虽相关记载作者已然无法一一考证，但其所云必有本，所言必有据，因而亦有较高的可信度。

²[1][3] 胡延龄：《扬州评话小史》，《申报》1925 年 5 月 17 日第 7 版。

[2] 董国炎：《扬州评话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9-79 页。

此文作者胡延龄，生卒年不详，字松庐，号松溪居士，浙江余杭（今杭州）人。其父“为某省县宦，后以事去职，拥资颇巨”^[1]。胡父早故，胡因交友不慎，以致家道中落，后在朋友帮助下，以演戏、撰稿为生。胡于传统曲艺书画建筑诸类均有钻研，《申报》曾连载其所撰《中国图画史述略》《中国雕刻史》《国画源流考》等札记。这类具有学术启蒙性质的文章，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对相关行业均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以其撰写的这则《扬州评话小史》来看，详尽地叙述了扬州评话自清人汪中创立以来的发展小史，叙述到扬州评话派系、流传，评话脚本的演变，评话的没落和中兴，评话在民国时的发展简况等诸方面，为研究扬州评话早期的生成、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新材料。其艺术史论与评话阶段性划分，也极具学术启示和参考价值，可与张岱、钱谦益、吴伟业、黄宗羲等人关于柳敬亭说书，李斗关于叶英、浦琳等人说书的文献记载互为补充，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扬州评话历史起源与发展的认识与研究。

二、无线传输：扬州评话的沪上演播

一直以来，扬州评话的主要演讲场所是书场瓦舍、堂会宴席之间。如《扬州画舫录》卷九：“大东门书场在董子祠坡几下厕所旁。四面团座，中设书台，门悬书招。上三字横写，为评话人姓名；下四字直写，曰开讲书词。屋主与评话以单双日相替敛钱，钱至一千者为名工，各门街巷皆有之。”^[2]又如嘉庆十三年（1808）林苏门的《邗江三百吟》，其《书场》载扬州评话讲演场所云：

无论大小人家，凡遇喜庆事及设席宴客，必择著名评词、弦词者，叫来伺候一日，劳以三五钱，一二两不等。此则租赁几间闲屋，邀请一二名工，内坐方桌架高之上，如戏台然，唱说不拘。^[1]

由此可知，传统扬州评话的讲演场所大都条件简陋，多为临时厝居或搭建的场所，几无陈设，讲书人的生存条件、收入可想而知。除去二三名家，扬州评话以及依赖这门行当存活的艺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江湖卖艺者流，同列一科”，并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荣。直到民国时期，扬州评话艺术家们受邀去沪上演播录播剧目，传统书场的讲演方式才发生了首次转变。

民国十三年（1934），张少夫、郎照明、王少堂等名家受“上海无线电台”之邀请，赴沪上录制演播相关节目。这标志着百年来扬州评话作为一门以书场为中心的讲演艺术，首次迈出书场之外，以“无线传输”这种颇为时兴的方式进入了听众的耳朵，极大地扩展了传播范围。听众只需在规定时间内将收音机调至相关频率，即可完整收听到评话节目，“音声极真，宛如眼前”^[2]，迅捷方便。沪上台录播扬州评话节目这一持续近两年的艺术盛举，对扬州评话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申报》保留了十三则相关演播史料，我们可以借此还原扬州评话当时在沪上无线电台的录播时况。

《申报》所载扬州评话在沪上演播剧目十三则告白，涉及张少夫、郎照明、王少堂等诸名家，包括《飞龙传》《宏碧缘》《水浒》《三国》等脍炙人口的演播剧目。最早记载的是1934年10月3日沪上“上海无线电每日节目”的告白，播放的是张少夫、郎照明先生的扬州评话剧目：

九时至九时半 新闻唱片

九时三刻至十时半 张少夫扬州评话《飞龙传》

十时半至十一时一刻 姚小庵庞学卿《珍珠塔》

十一时一刻至十二时 郎照明扬州评话《宏碧缘》^[3]

^[1]胡延龄：《松庐闲笔》，《新世界》2版，1923年9月15日。

^[2]（清）李斗著、许建中注评：《扬州画舫录》，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

从告白内容来看,“上海无线电台”播放曲艺类节目通常是在深夜,正是劳碌一天的听众休息闲聊之时,电台是他们了解外界、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张少夫《飞龙传》紧排在时政新闻唱片之后,这样设置是为了不挤压电台播放时政新闻等重要节目的时间。在穿插弹词《珍珠塔》之后,又续接朗照明扬州评话《宏碧缘》,足见电台对扬州评话的青睐。1934年11月2日和11月13日,沪上“上海无线电每日节目”又连续播放了张少夫、郎照明先生的扬州评话节目^[4],并同样在该日《申报》上刊登告白,告诸同好。

需要指出的是张少夫《飞龙传》、郎照明《宏碧缘》等剧目,是由电台事先录音而后向沪上爱好人士播放。首位在沪上实地演播扬州评话的,是名家王少堂。其实在王少堂登台实地讲演《水浒传》之前,“上海无线电台”“中西电台”“大中华”等电台曾陆续播出过其讲演的《水浒传》录音^[5],”已获得一般听众之赞许”。由于上海此前从未设置过扬州评话书场,少堂先生受邀在电台录播《水浒》只是“探路”,其真正的目的,是“将扬州评话的艺术真正带到上海去”,并且抱有携艺闯上海的赤诚之心:“行艺不能怕挤轧,越是新鲜玩意多的地方,我偏要挤进去打场子,我避它的长,扬我独有的东西”,让扬州评话在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站稳脚跟”^[6]。从1935年7月起,王曾多次登台献技,为沪上诸公奉献了书场的扬州评话魅力。1935年7月6日,《申报》刊发告白曰:

扬州评话名家 王少堂开讲《水浒传》地点在浙江路萝春阁

扬州评话专家王少堂君,以演讲《水浒传》得名。王君莅沪未久,已获得一般听众之赞许。惟多数听众鉴于王君一向悉由电台播音,均以未得亲睹王君丰采为憾。最近由镇扬旅沪人士之请,特在浙江路萝春阁茶社辟一书场,敦请王君现身说法,当蒙首肯,已于昨日开始演讲,时间定每晚八时半至十时半。按王君前在镇扬各地献技时,听众有“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堂”之谚语,由此可见王君艺术受人欢迎之一般(斑)矣。^[1]

因电台先录播王少堂《水浒》之故,“王派水浒”已在沪上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次实地说书,更是得到了观众极大的赞许,并有了“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堂”的谚语。与前述电台播放张少夫、郎照明等艺术家扬州评话节目不同的是,王少堂实地说书时间安排在“每晚八时半至十时半”黄金时段,时长为两个小时,中间绝无穿插,听众可以直观而连贯地感受到扬州评话的书场魅力。可以说,王少堂先生及他的“王派水浒”,在上海听众眼里,代表了扬州评话的最高水准。这同样也说明王少堂先生欲在上海开设扬州评话书场的愿望得以实现。

1936年1月17日,《申报》刊发樊松山先生开讲扬州评话《平妖传》的告白:

特请扬州评话大家樊松山先生开讲《平妖传》

本场座位宽适,火炉等一切设备完美,特聘扬州说书名家樊松山讲《平妖传》及《岳传》。此两部书是扬州说书鼻祖金国灿编出,比《水浒》、《三国》诸书尤多奇趣。樊君得金氏真传,说口清妙,尤喜诙谐。每至书后加说两个滑稽笑话,以助听众余兴。^[2]⁵

此番说书人樊松山,生平不详,民国年间扬州评话艺人。从其师承金国灿及其讲说《平妖传》及《岳传》等作品来看,樊氏

⁴[1](清)林苏门:《干江三百吟》,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121页。

[2]《上海电台广播节目告白》,《申报》21版,1934年9月27日第22069号。

[3]上海无线电台:《更动节目》,《申报》19版,1934年10月3日第22076号。

[4]参见《申报》23版,1934年11月2日第22105号;《申报》19版,1934年11月13日第22116号。

[5]参见《申报》12版,1934年11月11日第22114号;《申报》18版,1934年11月18日第22121号;《申报》21版,1935年5月21日第22295号。

[6]王筱堂口述、李真整理:《艺海苦航扬州评话“王派水浒”回忆》,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2年版,第66-9页。

⁵[1]《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开讲〈水浒传〉》,《申报》13版,1935年7月6日第22340号。

[2]《特请扬州评话大家樊松山先生开讲〈平妖传〉》,《申报》21版,1936年1月17日第22531号。

属胡延龄所云“旧派”艺术家。但樊氏评话并不一味因循传统而是融入自我独特创见，突出“奇趣”之旨；又根据观众口味，加以“滑稽笑话”结尾，颇具幽默，因而亦获得不少观众之青睐。

《申报》所载扬州评话沪上演播的史料集中在1934年到1936年年底之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时局急转直下，“上海无线电台”“中西电台”等录播扬州评话、弹词等曲艺节目也受到了影响，曾一度停摆。自此直到抗战胜利前，扬州评话艺人们去沪上演播、实地讲演节目的次数，已大为减少。

三、名家纷呈：扬州评话家小传

扬州评话在上海的录播与实地说书，除了引起沪上“迷醉之听客”的青睐与捧场外，也受到了相关理论界专业人士的关注。《申报》载有一则关于扬州评话名家康又华、王少堂在上海说书时况的评论文章，作者署名为“老舒”，属于为数不多的“时人评时艺”的文章：

扬州评话家中之康又华，为著名说《三国》名家。伊为康国华之子，得呈令誉，确是家学渊源。王少堂则以说《水浒》为人喜听。今一时瑜亮两人，康日档，王晚档，平分秋色，各拥有迷醉之听客。说书技艺，贵在交代清楚，结构呼应，尤应谨严。穿插固为惟一，惟亦要安置恰到好处。词句亦当使有耐人寻味意，否则即感枯燥恶劣，未有不自觉索然者也。而传亦属说书家必具之要件，能号召听众不致厌倦，便算能力矣。康、王之艺，虽在伯仲之间，但可窥其功能，试言所得：《水浒》侧重社会方面，穿插可以加多，择词不妨从俗；《三国》则较单纯，乃至一切动（作）神情，非可偏于投好，必须俗不盖雅，始克赴之。两书虽同有含追古励今之意，说者难易，同有轩轻。今康、王合作，富有雅俗共赏之魔力，亦不无可为上海书场添一页新纪录也。^[1]

这是一则关于扬州评话名家在沪上实地演播的记录。康又华（1898-1951），原名文荃，艺名幼华、又华，江苏扬州人，民国时期著名的扬州评话家，以讲《三国》风闻书场。从前述胡延龄文可知，扬州评话《三国》脚本最早源于同治年间李国辉，后由康国华、吴国良等人秉承，康又华讲《三国》，颇有乃父国华之遗风。康又华虽为扬州评话名家，但关于其人实地讲书情况的记载绝少，这篇文章则保留了宝贵的实况资料。从文章内容看，在当时上海书场，康又华之《三国》、王少堂之《水浒》，齐名沪上，一时瑜亮。为避免演出时间撞车，“康日档，王晚档”，这也体现出书场节目设置的合理性。两位名家的评话也各具特色，王少堂《水浒》“侧重社会方面”，穿插较多，词句从俗；而康又华《三国》则较为“单纯”，动作神情，“必须俗不盖雅”。二人一俗一雅，合作说书，为上海书场增添一页新纪录。

更重要的是，老舒此篇文章，结合康又华、王少堂等名家的说书特点，进一步指出了扬州评话在创作讲演时所应具备的艺术标准：在内容上，要“交代清楚，结构呼应，尤应谨严”；在衔接穿插方面，“亦要安置恰到好处”，不使听众觉得突兀；在脚本词句上，要“使有耐人寻味意”，使人揣摩回味，具有深刻内涵；在艺术审美上，以“追古励今”“雅俗共赏”为艺术追求。老舒此番建议涉及扬州评话的内容、脚本、穿插、艺术审美诸方面，见解独到精湛。老舒指出的这些创作标准，既是对扬州评话百年演变所形成风格特质的艺术总结，亦可视作扬州评话创作讲书的重要指导原则。

作者老舒，原名舒舍予，又号舍翁，是民国时期沪上著名的剧评家。老舒曾多方奔走，“置设书场，登发告白”^[2]，始及康又华、王少堂诸家来沪演出，又在《力报》《晶报》等沪上媒体上撰写相关文章替其宣传，为扬州评话在沪上的一系列演出做出不少努力。

总体而言，1934-1936两年间，张少夫、朗照明、樊松山、康又华、王少堂等先生的评话节目先后在沪上录播或实地演出，形式多样、精彩纷呈，也获得了广大听众的青睐和支持。这实际上是百余年来扬州评话首次远跨乡土演播沪上。此一集体式举动，既是扬州评话在当时艺术中心的集中展示，也表露出扬州评话艺术家欲与其他艺术门类“切磋学习、扬长避短”的决心和信心。而在电台录播扬州评话的“过电”方式，则让传统艺术与时兴技术碰撞与结合，打破了传统书场的限制，极大地拓展了扬州评话的传播方式和范围。以王少堂、康又华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在沪上录播节目、开辟书场的积极举动，也展现了民国时期扬州评

话艺术家携艺“闯”上海，让其在人文中心“站稳脚跟”的决心。民国年间扬州评话能在国事纷繁、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陆续演播，可见这种艺术形式不但有着稳固的受众市场、迷人的艺术魅力，而且有着坚韧的艺术精神。

《申报》中还有一篇洪为法的《扬州好》，文章写于 1948 年春，中间涉及了扬州评话在当时的状况：“可惜现时扬州花局甚少，已是花事阑珊，无复常年绚烂，而说《清风闸》的还有，说《飞渡子传》的已不可复得。就扬州评话界说，尤令人有老成凋谢之感。”^[3]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扬州评话界人才凋零，一些脚本剧目濒临失传，不复往昔。可见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扬州评话受时局和战争影响，发展基本处于停滞期，“老成凋谢”。此间唯有王少堂等少数艺术家在挚友的帮助下，仍在上海“大中华”“大舞台”等舞台剧院零星讲书，带领扬州评话在夹缝中艰难发展，度过荒期。

四、结论

《申报》所载有关民国时期扬州评话的十六则史料，始于 1925 年 5 月，止于 1948 年 4 月，跨度达 23 年。通过前述回顾，这些史料既有扬州评话史的叙述，又有新的传播方式的演播、新书场开设的记录，也有“时人评时艺”的艺术批评，内容丰富，材料宝贵。这些关涉到扬州评话在上海书场内外的报道，是研究民国时期扬州评话演出发展的宝贵资料。通过这些史料的考梳，可以进一步了解扬州评话在民国时期的变迁发展与显著特征：

民国年间扬州评话的演播，打破了清代嘉道以来“东至通州、南至镇江、西至南京、北至清江”的演出地域限制，沿江而下，演之沪上，扩展了演出渠道和范围，吸引了一批“迷醉之听客”，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民国时期扬州评话艺术家们秉持着携艺“闯”上海的赤诚之心，将这门在江苏扬州孕育成长的地域性评话艺术，带入到空间更为广阔、艺术氛围更为浓厚的上海等地，不但提高了其地位和影响，也为其后续复兴提供了来自异地他乡的支持动力。

新式传播技术的革新往往是传统艺术门类得以拓展和传播的重要媒介，这在扬州评话传播过程中也得以体现。在沪上以“无线传输”的方式录播扬州评话，标志着百年来扬州评话作为一门以书场为中心的讲演艺术，首次迈出书场之外，以“无线传输”这种颇为“时兴”的方式进入了听众的耳朵。这不但打破了以书场为中心的传统空间限制而且极大地扩展了扬州评话在听众中的传播和普及范围。

总体而言，受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民国期间扬州评话的演出和发展一波三折，但这也是扬州评话名家荟萃、节目纷呈的重要时期。影响较大的即有张少夫《飞龙传》、郎照明《宏碧缘》、樊松山《平妖传》、王少堂《水浒》、康又华《三国》等剧目，这些不同风格、不同剧目、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交织、碰撞，在说书场上，尤其是在艺术品类众多的上海书场一时兴盛。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扬州评话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从《申报》所载扬州评话的演出剧目看，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扬州评话的脚本新旧交织，节目众多，既有如《广陵潮》《战地莺花录》《好青年》等新编剧目，亦有如《水浒》《三国》《平妖传》《岳传》等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老一辈艺术家在讲演传统剧目时并不一味照本搬演，而是自有创新。如樊松山以“奇趣”擅场、加之以“滑稽笑话”结尾，王少堂《水浒》和康又华《三国》注重评话“结构呼应”“穿插恰到好处”“词句耐人寻味”等，说明老一辈艺术家在“追古励今”“雅俗共赏”艺术标准指导下，一直追求贴合时代，贴近大众，并为之积极改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受时局影响，扬州评话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此时仍有《清风闸》等传统经典剧目活跃于书场，亦有王少堂等少数名家带领扬州评话在夹缝中艰难发展，度过荒期。民国年间扬州评话能在国事纷繁、内忧外患的社会大背景下陆续演播，在夹缝中得以存续，也与其自身坚韧的艺术精神息息相关。

^[1] 佬舒：《记扬州评话家康、王》，《申报》12 版，1940 年 12 月 6 日。

^[2] 舒舍予：《康又华在大中华说三国》，《力报》4 版，1940 年 12 月 25 日。

^[3] 洪为法：《扬州好》，《申报》7 版，1948 年 4 月 7 日第 25193 号。

民国时期扬州评话的发展和变迁也给当下艺术的传承带来一些启示。任何艺术都与国家的兴衰同步发展,扬州评话亦是如此。如今我们的社会环境已远优于民国时期,艺术传播的手段和方式也更加丰富多元,在未来传承和发展扬州评话时,我们还需向前贤艺术家们学习,以谦恭、敬畏的姿态,在脚本新编、结构穿插、讲演内容、传播手段诸方面积极创新,贴合时代,贴近听众,传播时代声音,讲好中国故事。